

■ 江苏省一级期刊

■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期刊

■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

JOURNAL OF NANJING PARTY INSTITUTE OF CPC

学报

2010 **1**



JOURNAL OF
NANJING PARTY INSTITUTE OF CPC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

学报

- 江苏省一级期刊
-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期刊
-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
学报
(双月刊)

目 录

马克思主义研究

- 005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启示录
——今天我们究竟该如何“走进马克思”? 朱荣英
- 011 契合与选择
——传播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惊涛 李永枝
- 015 试谈《大众哲学》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历史经验
樊瑞科

经济研究

- 020 析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积极作用 任新民

政治学研究

- 023 胡锦涛对我党“三农”思想的新贡献 方辉振
- 028 效用模式、价值模式、权利模式:欧洲一体化动因新探
严骁骁

法学研究

- 034 宪政基本要素及其结构
——也谈“宪政是什么” 程汉大
- 044 环境法学基石范畴之辨析 刘卫先

公共管理

- 054 OECD 国家政府中的协调机构
——实践概览与基本经验 周 望

目 录

060 论政府购买行业协会服务的内在机理 周 萍

064 农村土地流转中介组织的培育与发展问题研究
王志章 兰 剑

党建研究

070 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的经验 双传学 徐 腾

076 有效性:执政党的建设的新视角 张广辉

080 加强党的根本宗旨建设应把握的基本原则 王浩斌

084 提高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民主质量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课题组

社会学研究

091 中国农村研究与社会科学主体性的建构
——兼评贺雪峰著《什么农村,什么问题》 刘 涛

095 新时期资源节约观的主要意蕴 黄爱宝 沈 莉

市情研究

100 关于南京市农民消费意愿、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的调查
课题组

107 关于南京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若干思考 戴维新

书 评

111 案例教学的生动教材
——简评《南京地方政府管理案例》 桑学成

主办单位: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
南京市行政学院

编 委 会 主 任:张 丽

编委会副主任:张义生

刘喜发

王玉珍

编委会成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辉振 吴 抒 吴澄清

李桂华 邵建光 郝继明

郭榛树 曾向阳

主 编:张义生

常务副主编:郭榛树

编辑、出版:本刊编辑部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1672-1071

国内统一刊号:

CN 32-1783/D

2010 年第 1 期

总第 45 期

2010 年 2 月 10 日出版

地 址:南京市白下路 257 号

邮 政 编 码:210001

电 话/传 真:025-84408132

电 子 信 箱:njdxxb@vip.sina.com

承 印 单 位:河海大学印刷厂

定价:10.00 元

JOURNAL OF NANJING PARTY INSTITUTE OF CPC

No.1.2010.(General No.45)

Main Contents

-
- (005)The Revelation of Derrida's "Specters of Marx": Today, We Wonder, How "Into Marx"?
..... **Zhu Rongying**
- (011)Fit and Selection: Communication Perspective of Marxism in China
..... **Ma Jingtao, Li Yongzhi**
- (015)On Historical Experiences in Realizing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in "Popular Philosophy"
..... **Fan Ruike**
- (020)On the Positive Function of RMB Appreciation of China's Economic Structure Adjustment
..... **Ren Xinmin**
- (023)Hu Jintao's New Contributions of on the CPC's thought of "Agriculture, Rural, Peasants"
..... **Fang Huizhen**
- (028)Utility Model, Value Model, Right Model: A New Approach for Studying European Integration
..... **Yan Xiaoxiao**
- (034)On the Meaning Elements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Constitutionalism **Cheng Handa**
- (044)Analysis on the Footstone – concept of Science of Environmental Law **Liu Weixian**
- (054)Coordination Organizations in OECD Countries' Governments: Practice Overview and Basic Experiences **Zhou Wang**
- (060)Deep Causes of Government's Purchase on Public Service from Industrial Associations
..... **Zhou Ping**
- (064)On Cultivating and Developing 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s of Rural Land
..... **Wang Zhizhang, Lan Jian**
- (070)On the experiences of the CPC's Summarizing Its Historical Experiences
..... **Shuang Chuanxue, Xu Teng**
- (076)Effectiveness: A New Point of View on the Construction of Ruling Party
..... **Zhang Guanghui**
- (080)On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Enh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s Essential Aims
..... **Wang Haobin**
- (084)Investigation and Consideration on the Improvement of Democracy in Cadre Selection and Appointment Work **Ke Ti Zu**
- (091)On China's Rural Research and the Subjectivity Construction of Social Sciences:Comments on He Xuefeng's "What is Countryside, and What is Its Problem" **Liu Tao**
- (095)On the Main Connotation of Resource – saving in the New Era **Huang Aibao, Shen Li**
-

Translator: Wan Shuyu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启示录^{*}

——今天我们究竟该如何“走进马克思”？

朱荣英

(河南大学马列德育部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面临后现代理性的挑战,关于马克思主义究竟向何处去、命运会如何的问题,德里达认为我们必须以一种还债的心态走向马克思,通过奋力的开拓和创新使之不断以新的方式获得再生和转生。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真理,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将这种核心思想和主导意识边缘化、泛化和中立化,否则就会造成它与时代的脱节和断裂,磨平它的思想锐气,耗尽它所有的精神能量;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多样性的统一,只有深入到使之分离又使之结合为一体的内在本源处(社会实践)那一度中去思维,才能真正继承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并使之以新的形式和姿态进入我们的时代文明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面向实践、面向未来的理论特质和基于实践需要不断实现自我革命的内在生长机制,正是由于它自己的这种实践性品格和把握实践矛盾的特殊能力,才使之赢得并重现于后现代并建构一种“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

[关键词]德里达;走进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10)01-0005-06

相消解?重读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能给我们带来深刻的启示。

作为一向反马克思主义急先锋的德里达,20世纪70年代以后却一反常态,从原来不相信甚至反对马克思到急转身走进马克思、选择马克思、拥抱马克思,并极力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立场和历史价值辩护。当有人问他为何在这个关键的预示性时刻向马克思致敬时,他则说此时“正是时候”,只有此时走近马克思并与之亲密握手才显示出我的那种不同寻常的“政治品格”。其实,这正是德里达能高瞻远瞩而不同凡响之处,说明他能在关键性时刻,以敏锐的洞察力直接或间接地瞥见到世界历史发展的某些端倪和大致走势,并对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内在张力关系加以批判和审视。在他1993年出版的《马克思的幽灵》中分析道,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往何处去、我们应该怎样走近马克思,怎样利用马克思的思想资源应对各种文化危机,如何实现

—

时下,面对后现代光怪陆离的话语背景,在马克思主义研究视域中,德里达认为应将更多的精力和目光投向马克思主义自身,用实在性的科学态度引领并开拓它研究的当代方向,以维持其对时代主题的理论敏感性、对社会变革实践的参与热情,捍卫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生存权与合法性。唯此,才能巩固其精神指向的时代立场,自觉回应与抵制来自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所蕴含的解构策略的挤压与冲击,真正实现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某种跃迁。无论从理论上或者实践上看,各种后现代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热情拥抱”,实际上是站在各自特定的政治立场上,通过特殊的理论谋划试图建构“被后学者们重新写过”的各种“后”版本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意义构造抑或是对它的变

*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资助课题: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关系研究(HK09-10)。

[收稿日期]2009-12-23

[作者简介]朱荣英(1963-),男,河南尉氏人,河南大学教授,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转向,这的确已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当然继承者,我们应该如何走进马克思并继承他的精神遗产,又怎样使之成为我们的同时代人呢?他认为,必须认真研读马克思的著作,否则,若不去阅读且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将永远都是一种错误,而且越来越成为一种理论的、哲学的和政治的责任方面的错误。此时,正值前苏联教条的机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机构全都处在消解之时,我们便不再有任何理由为逃避这一责任辩解。因为,没有这种回到马克思的责任感,也就不会有将来。“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精神。”^[1]他自己还曾自责的说,就我个人而言,把《共产党宣言》中最为醒目的东西忘得如此彻底,这肯定是一个错误。这表明:德里达看到了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牵手将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正是其中蕴含的这种后现代意蕴才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永恒的历史性价值,成为永远的光荣和永远不死的事业;如果真有一种我们永远也不打算放弃的马克思主义精神,那么,它作为一种全新的话语实践——批判的精神和实践的态度,毋宁说是某种对于思想解放和文明获救的肯定,是某种许诺我们可以设法摆脱任何独断观念,甚至摆脱任何形而上学——宗教的预定,摆脱任何救世福音的体验;而苏东剧变只是意味着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瓦解,而马克思主义的“幽灵”——批判性方法和实践性精神,并没有销声匿迹,相反,而是四处弥漫、普遍播撒,早已深入人心并成为大众文明和时代意识的构成要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超越的意义视域,永远都不能没有马克思,否则,人类将失去对未来的思想引领。但是,研读马克思的文本必须是“超越学者式”的,即理论联系实际式的解读,这是马克思主义能不断获得重大发展的源泉。而某种传统马克思主义,如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苏式马克思主义的消解,使马克思主义终于甩掉了教条式的沉重包袱,实现了一次超越性的解脱,从而可以集中精力深入研究专属于马克思自身的東西了,这反而会使马克思主义在与实践的结合中,实现某种层次上的跃迁。^[2]

二

德里达认为,对马克思主义遗产的继承必须加以选择,原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记忆的诱惑”——盲目崇拜,不得不加以抵制。但作为“在我们的整个一生中共同享有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方法,这个最重要的精神遗产,“曾经是”“仍然是并因此永远是”“绝对地和整个地确定的”,在今天的文化发展中,“在一种不可估量的深度上仍然保留着这一遗产的标记。”^[3]换言之,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方法,作为以解构和颠覆为主要特征的后现代主义最有价值的东西,作为四处飘荡和随意播撒的幽灵,已经成为我们共同的精神储蓄物和最基本的文化因子,不管你是否意识到它,不管你是否真的信仰它,它必然会对今天的社会文化产生重要的影响。在这里德里达似乎有些矫枉过正,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方法当然重要,对其价值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会过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不能借口凸显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而将它方法化,否则就窄化、小化甚至贬低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意义。显然,德里达是通过认同马克思的方法而走进马克思的,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仅仅在于方法,必须将方法置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地位,一个人即使接受了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只要他忽视了马克思主义方法,就没有资格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与此相反,一个人即使对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存有异议,压根不相信它的那些最重要的结论,但他只要认可了马克思主义方法,就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一点上他与卢卡奇是一致的,后者就曾说过:“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指不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的各种研究成果。它并不是指这种或那种信条,也不是指对‘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正统性仅仅是指方法”。^[4]德里达甚至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肯认,并不一定要求我们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反马克思主义者,也完全可以认同它的方法。它的方法犹如一个幽灵,无处不在,随时可见,飞扬在人类文化和时代意识的上空,已经渗透在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已经处在马克思主义的阴影中,无论如何再也不能没有马克思那样的研究了,不论是以可见的方

式抑或不可见的方式,我们根本不能拒绝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我们别无选择地要受它的方法的内在牵引,无论如何绕不开它的幽灵对我们的缠绕,马克思主义早已成为时代精神的组成部分,由于它的理论影响的广泛性和深刻性,今天的人们不得不在每一个层面对它的观点和方法做出回应。这个观点带给我们很深刻的理论启示:首先,马克思主义既是最根本的世界观又是最高层次的方法论,它的结论和方法是有机统一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更不能把一个吹上天、把另一个踩在脚下。但在具体使用中,方法的意义和价值的确又高于或大于结论,如果结论是金子,那么,方法就是点石成金的手指头,因为方法能够扩大结论的使用范围、能够“转识成智”、能够提升它的理性层次。其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我们的行动指南并成功地塑造了当今时代的思想背景,这样说,一般地并没有错,但问题的实质在于马克思主义方法本身有许多层次,既有核心层又有中间层和外围层,有的适用范围较宽,有的适用范围较窄,很显然,我们“不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所有论述为指导,而应当是以他们思想中那些经过实践证明是科学的并且具有普遍意义(即对中国有指导意义)的理论为指导”。^[5]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原则在具体实践中,的确有一个功能选择问题,根据具体情况和不同的需要,有时把这一方法或那一原则作为指导思想提到首位并加以强调,这并不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更不是在搞实用主义,而恰恰是其辩证性的最高体现。可见,一方面对“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也要辩证地看待,既张扬方法的重要性又不能将之方法化,既强调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又不能忽视方法的独特功能,只有在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中整体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及其当代价值,才能避免实用主义,才不会走向极端。另一方面,要从学理上搞清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蓬勃向上的生命力,不仅仅在于它的方法具有多大的理性能量,而在于它能够从整体上与每一个“当下在场”的思想体系发生历史性的视域整合,通过返本开新的方式为自己奠定全新的思考起点,进而凭借历史话语的当代转换以彰显自己的开放性与合法性。

三

德里达试图以一种原教旨主义的方法回到并走进马克思,这与他早先恶意的阉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相比,应该说这确是一种进步。他倡导完全割断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政治的纽带,拒斥马克思主义的任何干扰——尤其是马克思本人不停地言说的鬼魂的干扰,那样,虽说“我们将平和地、客观地、不带偏见地对待他:依照学术规则,在大学,在图书馆,在学术讨论会上!我们将系统地研究他,遵守阐释学、语义学、哲学的注释规范。”^[6]但是,一切果如是,即使能够回到马克思,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又如何向着实践和未来不断生成呢?若真能回到原教旨主义的马克思、回到马克思精神事件本身,那它就不是作为理性批判和改变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而存在,而是作为只在高楼深院、书斋讲坛供人把玩的马克思主义而存在,作为一种“无害的偶像”的“纯学术的马克思主义”而在书本中存在。^[7]若真的这样回到马克思、走进或走近马克思,那实质上是在唆使人们脱离时代、无视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变化,停留在对它的文本的考古学诠释上,把对它的研究变成“理论实体主义”或“文本至上主义”的文牍性操作,那对它造成的危害就太大了。可见,德里达提出的回到马克思不是回到共产主义的马克思那里,而是回到非共产主义的马克思那里。在德里达看来,其实马克思主义不专属于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也不专属于某些政党和政治集团(指前苏联共产党),他的著作应列入世界政治哲学的伟大经典行列之中,它们被排斥在这个行列之外真的太久了,现在应是刻意强调回到马克思、实现它的本性复归的时候了。对此,西方人一直存在着一个严重的误解,认为苏东剧变意味着共产主义事业的破产,残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发生严重扭曲而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方向,就是干脆放弃了社会主义的选择而投进了资本主义的怀抱,因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正在日益消亡,所以尽管它的幽灵四处游荡,它对当今世界造成的威胁已微乎其微,大用不着为之担惊受怕了。德里达却认为,马克思主义只要是“幽灵”,“它总要化成肉身”,总要构成新的威胁。“本质上,那幽灵就是未来,它总归会到来”。^[8]换言之,任何回到马克思都

不是对之的崇古意识或退回到原点,都只能是各种思想视域的时代整合和对当代问题的积极言说,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当代价值,仍然是当代最伟大的真理,苏联共产主义的旗帜倒下了,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却没有倒下,仍然是当代人追求和奋斗的旗帜与目标,即使“在一种新的世界紊乱试图安置它的新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位置之际,任何断然的否认都无法摆脱马克思的所有幽灵们的纠缠。”^[9]德里达试图向我们说明,不论西方谋士炮制的新自由主义如何诋毁马克思主义,如何急于埋葬马克思主义,它仍然无法拒绝马克思主义,无法拒斥马克思主义对这个世界的严重影响,马克思主义的语境早已成为现时代的主流语调,一种文化不论以什么面目出场,它仍然介于马克思主义强大的文化氛围之下。即使后现代主义一味解构马克思主义,仍然无法彻底消解它,反而又将一个解构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昂首挺立,并以否定的形式将之强行拉上后学平台,经过再三的解读使其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的内容,得以重新聚焦而复活,使之当代价值在不经意间大放光彩。西方传统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全球化针锋相对、格格不入,是实现全球化的最大障碍和宿敌,只有对之展开驱魔运动,才能使全球化运动进展顺利。但,吊诡的是,当值西方驱魔运动开展之时,一些谋士虽竭力密谋致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于死地,而另一些谋士却看到若马克思主义长时段地保持其原生形态,保持过去为人们所习惯借以辨别之和批判之的旧面相,那么要铲除之就极其容易;而若马克思主义不断改变形态,增殖新的价值,使之变成与新的形势完全适应的“新马克思主义”,此时要想颠覆之则极其困难。因而他们对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感到恐惧,而对那种能够与时偕行的马克思主义,则倍加忧虑,因为对之“尚未练好本事”,常常感到不知如何应对。有鉴于此,德里达郑重地告诫我们,我们必须有选择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因为在它的精神遗产中,并非所有部分都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它的遗产必须通过尽其所需地从根本上加以改变,才能符合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实际需要,既应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又要在总体上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生成,^[10]只有敢于融入社会实践,敢于对时代主题积极发言,马克思主义才能不断开辟新的自我生成之域。

四

德里达认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不是简单的照单全收,而是有选择、有扬弃的继承,继承的是它的最有活力的部分——实践批判精神及其立场和方法,而非它的已死的框架和模式。继承必须忠实愿意,但这远远不够,必须使之不断以改变了的姿态重新活在当代,因为继承不是一种给予而是一种使命,继承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拥有一切,可以凭之迅速在精神上暴富,继承的不是那种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莫里逊丸”,而是开拓创新的庄严使命。继承马克思就必须为他的立场辩护,但又不能固步自封,只满足并拘泥于现有的结论,为了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应对当今时代主题,马克思主义原有的思想和结论“以它们目前的形式而论,显得既是必不可少的又是不够充分的。”^[11]德里达后现代马克思主义遗产学,首先强调继承的是它的实践批判精神。在他看来,西方政要及其谋士竭力美化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原则,大力宣扬当代资本主义及其自由民主制度“解决了当代社会中的所有重大问题,从而历史已经开始终结了。”^[12]这种“历史终结论”试图表明,资本主义将获得永恒,而马克思主义已失去了批判对象,它将自取灭亡、自动失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批判精神已然烟消云散。与之相反,德里达认为,即使我们不一定认同整个马克思主义,但只要从马克思主义中汲取灵感,就不能回避它的实践批判精神,而且,在当代“为了在一种必然的无限进程的过程中使‘现实’适应‘理想’,求助于某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仍然是当务之急,而且必定是无限期地必要的。如果人们知道如何使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适应新的条件,……那么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就仍然能够结出硕果。”^[13]他进一步分析说,要想继续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中汲取灵感,就必须忠实于在原则上总是构成马克思主义而且是首要地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激进的批判的东西,那就是一种随时准备进行自我批判的步骤。这种批判在原则上显然是自愿接受它自身的变革、价值的重估、自我的再阐述的。我们应当把这种精神与其他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区别开来,因为其他的精神把自己固定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躯干上,固定在它假

定的系统的、形而上学的和本体论的总体性中。因此,让我们只讨论“好的马克思主义”,扬弃坏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消解并不仅仅局限于理论上或思辨层面,而是要它的思想与改变现实世界的实践密切联系起来,只有彻底颠覆资本主义的社会物质基础,才能真正消解附着于其上的“虚构的精神花朵”。这种大胆的消解,显然是一种“冒险的姿态”^[14],但正是马克思主义批判本性的内在要求,不如此就不能消解固定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上的许多过时无用的东西,只有拿起这种批判武器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继承。那么,今天该由谁来继承马克思主义的遗产呢?德里达认为:既然马克思主义是现时代我们共同的精神储蓄物,我们依然处在它的文化的阴影之下,那么,“忠实于某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的姿态,原则上说诚然是任何人义不容辞的责任”^[15]。虽然任何人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当然继承者,对马克思主义遗产继承的责任却并不是均等地落在每一个人肩上的,对一些人来说,至少在某一知识和学术领域的界限内,他们的责任尤其重大而迫切,作为精神上的马克思的同时代人,他们渴望继承那些通过马克思并借助于他而来到我们面前的东西,作为实践上的马克思的同时代人,他们急切地想把马克思主义改造成革新时代所不可或缺的内在构成因子。为此,他们急切地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反对在马克思主义身上搞某种形而上学的文化霸权。在法律上,一笔遗产总是对一项债务的再确认。同理,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遗产就意味着欠了马克思的精神债务必须偿还,必须以一种还债的心态走向马克思,通过奋力的开拓和创新使之不断以新的方式获得再生和转生。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真理,它将永远与我们同在,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将这种核心思想和主导意识边缘化、泛化、驯化和中立化,否则就会造成它与时代的脱节和断裂,磨平它的思想锐气,耗尽它所有的精神能量。

五

德里达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幽灵化,表明了它的当代处境酷似当年它产生时所面临的西欧神圣同盟的集体围剿:对之进行集体驱魔,公开宣告马克思主

义已死、共产主义已亡;这次围剿充满了密谋式的勾当,甚至玩弄骗人的魔术,表明围剿者对马克思主义伟大真理的恐惧心理以及急于在精神领域建立权威形式和新的秩序的迫切心情。面对“历史终结论”和“马克思主义死亡论”,德里达公开宣称“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死亡”,死亡的只是马克思主义的“躯体”,即原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政权”以及各种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等等,而它的灵魂或“幽灵”,即它的“激进的批判精神与方法”,则是永生的^[16]。无论如何不能没有马克思主义,否则我们将失去未来,马克思主义的解构精神将与时俱进、与时偕行。关于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命运会如何的问题,“其实是一个重复已久的话题的回声”,关于马克思主义已然终结的“这一些末世学的话题”,在许多年以前“就已经为我们所熟知了”。^[17]但今天旧话重提,则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新的含义,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如何的确已是一个摆在和我们的同处一个时代的绝对多数人面前的很棘手的问题了,同样的问题虽然历史上曾提过多次,但今天无论就提问的方式抑或就提问的内容来看,都有了新的变化。前苏联及东欧所信奉的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应与马克思本人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幽灵化的马克思主义严格区别开来,前者已成为强弩之末或者已然终结,并不等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消亡。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具有“幽灵的生产方式”,^[18]“马克思主义已死”叫嚣的声音愈高,愈能把人吵醒、把它激活,并使之处于来临状态、凸现自身在场的丰富性,从而激发人们以之为批判的武器,去重新安排周围的世界。如果德里达仅仅停留在“幽灵学”的范围内,通过分析幽灵的种种性质来论证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价值,那么,这种论证尽管富有特色,但还是表面化的、从而也是缺乏说服力的。所幸德里达并没有止步不前,而是在“遗产学”中做了进一步的拓展,指出遗产从来不是一种给予,它向来是一项使命,马克思主义只有在创新中才能实现新生和再生。应该说,这种论证还是因为太笼统、太间接而缺少穿透力。为了表征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德里达在“价值学”中又对它做了重大选择,再三指认马克思主义遗产的全部价值都归结为它的实践批判精神,它的全部意义就取决于它可用于分析当代人和社会的缺失,只有融入实践才能获得真正的出口。^[19]由于马克思主义遗产具

有局限性,并不是一个自身完整无缺的体系,这表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多样性的统一,只有深入到使之分离又使之结合为一的内在本源处(社会实践)那一度中思维,才能真正继承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并使之以新的形式和姿态进入我们的时代。同时也表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存在内在紧张,这不是其逻辑上混乱和学理上含糊不清的表现,更非削弱其影响力、降低其生命力并导致其多元化的根本原因,恰恰相反,而是它作为改变世界的理论所特有的展示方式,是其理论在实现自身过程中因把握住了实践的需要并与之相互作用、相互改造的特殊状态,是其实现自我反省、自我超越的内在根据,它呈现出的内在紧张意味着它正面临着理论创新的压力和动力,而克服内在矛盾的过程也就是它自我实现、自我发展的过程。可见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面向实践、面向未来的理论特质和基于实践需要不断实现自我革命的内在生长机制,正是由于它自己的这种实践性品格和把握实践矛盾的特殊能力,才使之赢得并见重于时代和未来,成为永远的光荣。^[20]德里达主张:“我们不是非得要求得到马克思的同意——他甚至在未死之前就反对这样做——才可以去继承他的观点:继承这样那样的观点,不过这并不是要去继承来自于他的观点,而是要去继承通过他、借助他来到我们面前的观点。”^[21]只有突破自身并参与时代变革,人们才乐意接受马克思的返回或返回马克思。不同的解读方式面对共同的马克思文本,会产生出截然不同的理论图景,回到马克思并非是为了维护一种原始意义的持存性,而是为了摆脱理论上的无根性和对它的先在性强制,并在符合原创性的当代解读中实现与历史语境的深层交融。德里达的这些对马克思祛魅的策略设计,实际上是试图带着我们今天最新的语境在一个更加开放的理性空间,使当代人能够捕捉住马克思思想逻辑深处的“当代动情点”并与异质多元的解读旨趣实现多方链接,从多层次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价值。这一点,的确难能可贵。

总之,早先作为反马克思主义急先锋的德里达

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却一反常态,从原来不相信甚至反对马克思到急转身走进马克思、拥抱马克思,极力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立场和历史价值辩护,并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超越的意义视域和“永远的光荣”,无论如何都不能没有马克思,否则人类将失去对未来的思想引领。但要想继续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中汲取灵感,就必须忠实于在原则上总是构成它的精髓的一种激进的批判性方法,而且认为问题的实质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全部意义仅仅在于它的方法,必须将之置于整个理论体系的核心地位,唯此才能激活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具有的面向实践的理论特质和基于实践需要不断实现自我革命的内在生长机制。

参考文献:

- [1][3][6][7][8][9][11][13][14][15][17][18][21][法]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 [2]付文中.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终结论”的理论回应[J].西南大学学报,2008,(5).
- [4][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 [5]庞元正等.哲学二十二讲[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
- [10][法]阿里夫·德里克.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全球化:当代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挑战[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2).
- [12]姚大志.现代之后[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
- [16]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19]陈炳辉.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J].厦门大学学报,2008,(5).
- [20]郑祥福.文化批判与后现代马克思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向阳)

契合与选择

——传播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惊涛 李永枝

(国防大学 北京 100091)

[摘要]从传播的视域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探寻其存在的可能与必然,直面意识形态面临的冲击与挑战,并作出客观的解读与展望,不仅仅是视角的变更和理论层次的完善,事实上也在进一步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好的途径、方式,追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承继发展的内在规律。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10)01-0011-04

传播是人类社会能够存在和发展的一种决定性机能。将马克思主义还原成信息本身,以现代大众传播理论为基本依托,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与跃升作概略分析,不仅仅是视角的变更和理论层次的完善,事实上也在进一步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好的途径和方式,总结、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规律,并进而开辟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崭新领域,因此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必然与可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历史前提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传播到中国并从此改写中国历史的进程,不仅因为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具有不可抗拒的真理力量,还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符合了传播得以进行的必要条件。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广泛传播首先内蕴于它的真理性本质。传播学认为,任何一种信息得以流传的前提在于它的有效性。也即是说这种信息必须能够对受众产生一定的效用,引起相应的兴趣,从而在某些方面满足受众的需求。独立和富强的命题自鸦片战争以来吸引了无数中国人,成为时代最强烈的呼声。而从太平天国的均贫富到洋务运

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乃至维新派的自我变革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三民主义”,却都不能给中国人民提供满意的答案,“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2]于是以世界眼光认识世界历史,其科学性和先进性得到了欧洲革命实践检验,一般性地指明了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解放道路,具有最高普适性的马克思主义正好满足了中国历史变革、现实斗争和民族解放的需要,使最先进的一部分人看到了超越资本主义、解救中国的另一条路。长期以来效法西方的心理定势遽然崩塌,时代思潮的转换逐步完成,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的扩张性得以充分体现,从而使其在中国的传播也有了首要的前提。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根源于它满足了传播所需的客观条件。这些条件包括:一是有了众多的传播者。从地主阶级开明人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无政府主义者到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初期,都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或多或少的介绍与评析,虽然其目的与用意各不相同,但都对马克思主义早期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二是拥有了顺畅的传播渠道。当时主要的大众传播的媒介是各种著作报刊。五四运动后的半年内,不仅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得以大量翻译出版,宣传

• [收稿日期]2009-11-18

[作者简介]马惊涛(1975-),男,国防大学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的进步报刊更是达到200多种,其中,报纸以上海的《民国日报》、《时事新闻》等为代表,杂志以《新青年》、《每周评论》、《星期评论》、《湘江评论》、《建设》等为代表。“一年以来,社会主义底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报章杂志底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主义(即布尔什维主义—引者注);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底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底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的中国,仿佛有‘雄鸡一鸣天下晓’的情景。”^[3]三是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进一步导致了议题设置。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体中,大部分都是当时的意见领袖,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推崇毫无疑问义加大了社会主义的吸引力,连带着马克思主义也在更大范围内为人民所了解;各阶级各阶层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社会主义所展现出来的浓厚兴趣,不可避免导致议程设置,反过来更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这些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步传播日趋广泛、深入、系统,并渐渐汇合成一种不可阻遏的时代潮流,为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研究乃至中国化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顺利传播还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价值的契合性。经典传播理论有选择性注意的认知,也即是说受众更愿意接收那些与他们所强烈坚持的态度、信仰或行为相符的信息。说服理论也认为,只有接收者理解所接受的信息,并将新信息内化为立场,才能得到期望的行为发生,而理解的关键,就在于新信息与原信息的契合。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比欧洲更容易被接受,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所秉持的价值理念有高度的契合性。这种契合性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作为人类文化、人类文明的总结和最高成果而出现的,在它的体系中容纳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部人类文化的积极成果;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核与中国传统价值观有一定的相通性,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变异思想、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同质点。因而这种契合“削弱了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认知障碍,奠定了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基础,为两种文化的结合提供了文化土壤和内在依据”。^[4]

二、反馈与结合:传播过程中的中国化

控制论传播模式认为,传播不仅是信息的单向

流动,更是双向的信息传播回路。马克思主义传播在初期实践中的严重挫折,反馈到马克思主义传播本身,迫使一部分先进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不断思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现实问题。于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不可避免成为历史的必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首先来自于理论自身的适应性反馈。任何一种能够被广泛传播的信息必然要满足以下条件:除了它是有用的,能够被受众理解接受并满足一定的动机需要外,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在反馈中不断整合优化,从而更好地满足受众的需求。以能动的认识论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天生就具有开放性本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从来 not 认为自己的理论是亘古不变的终极真理,“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5]“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6]正是这种特性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了与时俱进的品格,也具有了依据“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的可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要想达到传播效果的最优化,就必然要求它能够在中国实际的互动中有所调适、主动适应,换言之也就是必须要使马克思主义适应中国的现实需求,把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与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普遍性结合起来,并不断发展创新,从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如果没有这种主动的适应反馈能力,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变成僵化的、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教条,也就从根本上丧失了它应有的生机和活力。因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将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万古如长夜;马克思主义不能依据中国的实际主动适应,其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就会缘木求鱼,不能获得内生性动力,轨迹似昙花。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还在于实践的接触性反思。传播的反馈来源于传播的实践。实践不但能够区分噪音和本原,也能够把受众最真实的需要反馈信息传播者本身。作为“从一开始就是现实的和直接追求实效的”^[7]实践性的马克思主义,在传播的过程中一方面它必须不断地被运用于实践,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接受实践的最终检验,防止信息失真,避免再解释过程中的自行其是;另一方面也必须能够如实、及时地反映实践的发展变化,反馈传播者并不断得以丰富发展。当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屡屡碰壁时,实践促使一部分先进的马克思主义

者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结合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不断思考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实践促使全党从对苏联经验的迷信和共产国际指示的绝对尊崇中清醒过来,深入探究怎样在中国这一特定历史范畴内实现马克思主义。不把马克思主义置身于中国社会的火热生活中,没有初期实践所给予的深刻启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就缺乏中国化的直接动力。是实践给予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迫切呼唤,也是实践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重要源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根植于文化的自觉整合。跨文化传播学认为,当某种文化形式穿越时间和空间而移动,在某个特定的时空中,这些文化和其他文化形式与环境必然产生互动、彼此影响,从而创造出新的文化形式,并进而改变当地的文化环境。“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或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实质上就是把马克思主义这种文化,移植到中国这个不同于德国的文化土壤上,就必然经过我国这个新文化场的过滤和加工改造,进行文化重构。”^[8]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必然要与中华传统文化产生某种程度的互动,要经过中国文化的重新整合与解释,并在中华传统文化因子中找到其新的生长点和结合点,这样它才能“通过民族形式来实现马克思主义,赋予其普遍原理一种新鲜活泼的并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一些特殊规律上升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高度来说明和发挥;在这两种文化的交合作用下,总结出一套关于中国问题的过去、现实与未来及其改造途径的理论体系和实践形态。”^[9]

三、挑战与超越: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现实解读

新中国的建立,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全国范围内的主导意识形态,并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现代化建设的政治保障和精神支柱,马克思主义传播伴随着这种时空转换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然而不容讳言,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也几欲出现被边缘化的危机。正视这种现实,并努力应对新挑战,做出新发展,实现新超越,是所有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一是正视理论发展的滞后性,用创新的精神解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时代性,努力夯实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理论根基。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滞后

性一方面表现为理论自身对实践的相对滞后反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一些新现象、新观点的解释还不够充分,对马克思主义现实存在必要性和合理性的论证还存在欠缺。另一方面这种滞后性还反映为在信息时代的今天,面对西方汹涌而至的各种主义和学说,理论上自我捍卫的力度和深度还有待加强。理论上的滞后无可避免带来思想上的困惑与置疑,同时也给现实中的马克思主义真理性带来严峻挑战,而不被真心认同的理论也就失去了传播的最初动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与时俱进,不但要紧跟时代步伐,不断深化对世情、国情、党情的认识,不断用发展着的理论修正、完善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新的实践;还要进一步加快理论武装的步伐,不断提高人们自觉运用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来分析、研究、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群众;真理只有被人民所掌握,也才能转化为锐利的武器。马克思主义只有以它无可辩驳的科学性不断证明其真理价值,才能被亿万人民所衷心信仰;也只有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展现其真理价值,也才能获取更广泛传播的原生动力。

二是关照现实,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解决实践中的难题,积极解决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实践合法性。实践既是理论的源泉,又是理论发展的不竭动力;既是理论的价值体现,又是理论真理性的唯一检验标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被广泛信仰和传播,不在于它提出了多少创新观点、制造出了多少别具一格的理论层次,而在于它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解决了无数中国的现实问题,并进而通过实践不断充实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最大的障碍还不在于理论本身,而在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的现实社会还不能够完全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等需要,还不能够满足人民理想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期盼。现实生活中的民生问题、收入差距过大问题、贪污腐化盛行的问题、宣传与现实背离的问题等等都直接影响着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公信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与发展。因此我们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着力点和落脚点,就在于要始终秉持以人为本理念,重民生、排民忧、解民难,始终聚焦现实生活中的热点、难点、疑点,为人民而发展,充分焕发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感召力,用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凝聚力量、呼

唤信心、塑造心灵、坚定信仰。

三是与时俱进,持续改进马克思主义宣传的手段方式,不断优化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合力构成。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把正确的理论裁剪成一些抽象的、片面的、标语口号化的政治概念,从而极大地减少了自身的吸引力;面对西方国家强大的意识形态攻击,传统的传统意识形态传播体制、传播手段的作用受到很大限制,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工作效果不断受到削弱乃至抵销;宣传中对意识形态的时代内容的丰富和体现还不够,没有很好地适应时代的变化,表达时代的呼声。正是宣传的滞后导致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和迷失,进而形成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排斥和冲击。“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新使命新要求迫使我们务必要改进宣传方式,优化传播格局,提升宣传绩效。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运用活泼生动、群众易于接受的风格、方式使马克思主义可亲、可近、可行、可用;另一方面还要重新整合现有的传播体制,营造大文化格局,构筑一个完整的系统和网络,各自发力、相互配合、遥相呼应,最大限度地发挥宣传合力;最重要的还是要充分发挥文本传播的传统价值,不断扩大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使马克思主义在复杂的新传媒环境中绽放立体的吸引力。

四、承继与发展:面向未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继承中发展,于变革中跃升,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在不断中国化的历程中分别针对不同的历史时空,解决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实现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和“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历史课题,从而在全球社会主义运动暂时处于低潮的今天,使“这边风景独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焕发出无穷的魅力,也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具有了更多的合法性。

但传播从来不是单向度的,任何一种理论的发展也不会总是一帆风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经历过无数的挫折和曲折,不论是“左”或右倾对马克思主义的伤害,还是“文革”期间对马克思主义的偏执理解,都曾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造成了极大危害,导致“人们似乎是一种本能似的并不怀疑自己进入共产主义的方式有无问题,自己对共产主义的理解有无问题,自己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方式

有无问题,而是怀疑‘共产主义’本身有无问题。”^[10]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束缚和禁锢其生命力,永远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和中国化进程中的首要问题。

实践没有止境,创新永无尽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远未终结。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永远放射真理光芒,就一定要遵循传播内在规律,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理解,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理性升华规律认识,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俱进改革创新,使马克思主义更好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始终代表人类同时代最可宝贵的文明成果,并最大可能推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模式。如是,则中国幸甚,马克思主义也幸甚。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
- [2]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0.
- [3]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1.59-60.
- [4]梁永.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C].硕士论文.
-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81.
-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2.
-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1.
- [8]祝福恩.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介与文化场问题[M/OL].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 [9]陈晋.毛泽东文化性格[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169.
- [10]沈传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曲折命运和经验教训[J].中共党史研究,2008,(2).

(责任编辑:向阳)

试谈《大众哲学》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历史经验

樊瑞科

(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研室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大众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的代表作,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中国化、现实化上具有开创性意义。《大众哲学》之所以能成为大众的哲学,其必然性体现在:从客观方面看,它抓住了时代主题,反映了现实需要,它阐释的“新哲学”本来就是为大众的哲学;从主观方面上看,是其作者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为人民探求真理;精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联系群众实际;采用通俗化的写作方法,贴近大众生活等。《大众哲学》作为这些主客观因素有机结合的理论结晶,从形式到内容都使之成为大众的哲学。

[关键字]艾思奇;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哲学;必然性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10)01-0015-05

艾思奇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党的理论战线的光辉战士。《大众哲学》是艾思奇一生致力于研究、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使之通俗化、大众化、中国化、现实化的代表作之一。《大众哲学》原名《哲学讲话》,原在上海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主办的《读书生活》半月刊上连载一年(1934年11月至1935年10),后集结成册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出至第三版时遭国民党书报审查机关查禁,1936年6月易名《大众哲学》再版,它产生于抗日烽火之中,可谓应运而生,风靡全国。卢国英教授认为:“通常说《大众哲学》共出过32版,事实上不止此数。据图书馆学专家雍桂良同志统计,32版只是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的版数,事实上,全国将解放前后共出过50版。还不算各地油印、石印、铅印等各种方式翻印的。”^[1](P95)

为什么一本不太厚的哲学通俗读物在既无任何政治权威的强制推行,也无任何学术权威的强力推荐,更没有抢眼的商业包装的情况下能够一版再版,

长盛不衰,直至今日仍散发着不朽的理论魅力?这不得不成为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因此,笔者想就此作一些粗浅的分析。

一、《大众哲学》之所以成为大众哲学的客观原因

(一)《大众哲学》抓住了时代主题,反映了现实需要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决定于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P11)如果哲学要真正成为大众的哲学,就必须关注和回答大众所关心的现实问题,正视时代所提出的重大课题。《大众哲学》的诞生就体现了这一点,它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那时的情况是中国处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长驱直入,民族危机加深,而当时国民党反动势力却无视现实,对内残酷镇压革命,对外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思想疑惑,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产生质疑,“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尖锐地摆在人们的面前。与现实相映照,理论界中封建文化鼓吹的“中学为体,西学为

* [收稿日期]2009-11-26

[作者简介]樊瑞科(1983-),男,河北省南和县人,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08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用”日益破产,在中国鼓噪一时的杜威的实用主义,叔本华、尼采的“生命哲学”影响日微,而陈立夫的“唯生哲学”和蒋介石鼓吹的“力行哲学”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都没有无法解答这一时代课题,可以说陈腐的封建主义哲学和近代以来从欧美贩运过来的资产阶级的种种反动哲学的衰败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宣传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所以,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的出版可谓适逢其时、应运而生,它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状况,指出了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武装了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使之走上革命道路,去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的。周扬在《艾思奇文集》序言中写道:“从一九三三年开始发表的一系列通俗哲学论文,到一九三五年集结出版成为《大众哲学》一书,是这一时期艾思奇同志的代表作。这些著作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青年在它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3](P4)}外国学者伊格纳修斯·曹也认为:《大众哲学》受欢迎是因为它满足了当时中国许多青年“思想和感情的需要”。他指出:《大众哲学》对那些在国家屈辱、沮丧、混乱之际的中国青年特别有吸引力。该书从精神和民族感两方面激励这些青年人,使他们振作起来,投身到改变国家和个人命运的伟大斗争中去。”^{[4](P37)}因此也就有了《大众哲学》动员十万青年到延安寻找真理的说法。这种说法虽有些夸张,但足以体现《大众哲学》的巨大影响,例如吴介民说:“正在苦闷仿徨的时候,我读到不少进步书刊。特别是《大众哲学》,像一盏指路明灯,教青年们从哲学的高度去认识世界,使我们懂得了“旧社会必然要没落,新社会必然要产生”(《大众哲学》语)的真理。”^{[5](P41)}黄楠森这样回忆道:“笔者本人60多年前就读过此书,深深地被它所吸引。它不仅使我初步知道了什么是哲学,引导我后来终身从事哲学工作,而且引导我倾向进步,并进一步倾向革命,倾向马克思主义。”^[6]

(二)《大众哲学》阐释的“新哲学”本来就是为大众的哲学

李公仆先生在其为《大众哲学》的前身《哲学讲话》所作的编者序中写道:“新哲学本来是大众的哲学,然而过去却没有一本专为大众而写的新哲学著作。”^{[7](P2)}所谓的“新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自己的哲学,是

表达他们对世界的认识,代表他们的利益和要求,为他们服务的,是他们在实践中改变世界的思想武器,是揭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社会归属和本质特征决定了它应该也可以成为大众的哲学。它不是供少数书斋中的学者把玩、欣赏的古董,它应该从哲学家的书本里解放出来,成为千百万人民群众手中的武器。《大众哲学》之所以获得成功,受到大众的欢迎,即取决于它阐释和宣传的“新哲学”的民众本性。艾思奇正是在中国人民急需一种科学理论来指导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的时候,为人们奉献了“辩证法唯物论”的“新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当时的国人来说,还是一种全新的外来思想,但是,其中所包含的真理已为当时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所了解。艾思奇作为较早接受马克思主义新思想的人之一,深谙这一具有鲜明无产阶级党性和革命性的学说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争取自由解放斗争所具有的指导作用和实践意义,并自觉担当起了实现这一学说中国化、大众化、现实化的理论使命。正如卢国英教授说:“《大众哲学》深入浅出的系统阐述,以巧妙的办法,在社会秘密发行,给大众特别是知识青年以新鲜感觉。并且《大众哲学》对古今中外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各种哲学流派的观点,做了令人信服的比较、分析、批判,用事实说明和证明新哲学——唯物论辩证法具有颠扑不破的真理性,是唯一可以信赖的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这是《大众哲学》在哲学理论上成功的根本原因。”^[1]

二、《大众哲学》之所以成为大众哲学的主观因素

(一)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为人民探求真理

为了救国救民,艾思奇在16岁时就出于爱国主义诚在云南省第一中学参加学生运动,并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青年努力会”。17岁时,因参加学生运动,险遭逮捕。当时云南的当权者唐继尧得知艾思奇是李日垓的二公子时,便下达命令:“杀不了老子也要宰了他的儿子。”为了摆脱云南军阀的魔爪,艾思奇便取道越南前往苏州。不久,去南京东南大学找大哥李生庄(共产党员)时,不幸被捕,成为被判死刑的少年犯,后经李根源保释出狱。此后,艾思奇在父亲工业救国思想的影响下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艾思奇参加了东京中共支部组织的“社会主义学习小组”,认真研读马列著作。济南惨案和“九·一